

红军长征草地纪实

红军过草地的胜利取决于方向的正确抉择

正确方向的抉择取决于对国家民族的忠贞以及高瞻远瞩的战略

史小勇 / 编著



红军长征草地纪实

史小勇 / 编著

 万卷出版公司

© 史小勇 2006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红军长征草地纪实 / 史小勇著. — 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
2006. 10

ISBN 7-80601-794-1

I. 红… II. 史… III. 二万五千里长征 (1934~
1936) — 史料 IV. K264.4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11350 号

出版发行: 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65mm × 240mm

字 数: 262 千字

印 张: 18

出版时间: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佟晓波

封面设计: 刘萍萍

版式设计: 万晓春

责任校对: 侯俊华

定 价: 27.00 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386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 - m a i l: vpc@mail.lnpgc.com.cn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序 言

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行程二万五千里，摆脱了国民党军队重兵的围追堵截，翻越座座高山，涉过无数江河，走过有“死亡之旅”之称的草地。党中央率领的中央红军一路艰难西行北上，1935年10月19日先头部队到达吴起镇，11月2日与陕北红军会合，在陕北建立起革命根据地，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。

中央红军过草地期间，毛泽东所率领的党中央与张国焘错误路线进行了一场“北上南下”的斗争，避免了红军中的一场“内讧、内战”。党中央一路北上，实现了红一、二、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军在陕北的会合，壮大了革命力量，赢得了红军的全面胜利。

读长征史，走胜利路。中国红军由弱变强，由小变大；由失败走向胜利。最后一举战胜日本侵略者，一举打败了蒋介石国民党反革命集团，解放了全中国。

2004年9月，党和国家领导人、中央军委领导人江泽民、胡锦涛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高度赞扬红军精神，并要求全军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的精神，将红军历史代代相传。江泽民同志说：“希望军队永远保持老红军的政治本色。我军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军队，自红军时期起就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。这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集中反映了我军的性质和宗旨，体现了我军的政治本色，是我军的宝贵精神财富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如何继承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，是必须长期抓住并认真解决好的一个重大课题。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

革，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，全军官兵要始终珍惜我军的光荣历史，继承和发扬我军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，身体力行地把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一代一代传下去。”

2006年7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3次集体学习会上，中共中央总书记、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说：“只有铭记历史，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，才能深刻了解过去，全面把握现在，正确创造未来。”胡锦涛指出：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。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，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长期英勇奋斗的真实纪录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、推进理论创新的生动教材，是中国共产党人光荣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。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和充分运用这个精神宝库。曾几何时，毛泽东同志也曾多次号召全党都要“学点历史”。不读红军历史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，后人守成之不易。

中央红军从遵义到陕北的长征之路，也记下了党中央与张国焘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，从中可以领略到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。

2006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五周年，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面胜利七十周年纪念。在此，让我们一起重温党的历史，重走长征路，让红军艰苦奋斗的精神磨炼我们的意志，让红军顽强、拼搏、战无不胜的精神永放光芒。

目 录

序 言	001
-----	-----

第一章 走上长征路	001
-----------	-----

长 征 / 002

毛泽东取得领导权 / 009

第二章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	017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西进策应中央红军 / 019

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 / 022

会师前的四方面军 / 032

军事家曾中生之死 / 039

高原上的拥抱 / 044

争 吵 / 053

松潘战役 / 059

张国焘要权 / 064

矛盾冲突 / 070

沙窝会议 / 082

毛泽东的承诺 / 088

右路军过草地 / 091

包座之战 / 107

第三章 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北上	115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等 待 / 116

巴西会议 / 120	
叶剑英在巴西的秘密报告 / 129	
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北上 / 134	
张国焘另立“中央” / 147	
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/ 151	
张国焘南下失利 / 163	
长征中的朱德 / 172	

第四章 红二、四方面军会师北上 ————— 179

张国焘取消另立“中央” / 180	
红二、四方面军甘孜会师 / 187	
贺龙警告张国焘 / 193	
红二、四方面军北上 / 198	

第五章 党中央迎接红二、四方面军 ————— 207

红二、四方面军到达陕北 / 208	
毛泽东的缓兵之策 / 219	
建立统一战线 / 222	
血染河西走廊 / 230	
西安事变前后 / 245	
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 / 258	
张国焘叛逃 / 265	

后 记 ————— 272

参考书目 ————— 273

第一章

走上长征路

长征

毛泽东取得领导权

第一章

长 征

随着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战争的失利，中央红军的北大门、南大门被国民党军队攻破，时局越来越紧张，国民党军队不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，敌人飞机每天飞往瑞金红军指挥中心的沙洲坝狂轰滥炸，东线和北线都被敌人突破，西线也将被敌人封锁，中央红军反“围剿”已完全不可能了，中央红军的出路只有一条，那就是——长征。

1934年10月10日晚，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10万人，从瑞金等地出发，被迫实行长征。

毛泽东是如何走上长征路的？当时，中央临时总负责人博古和李德已将毛泽东排挤在外，毛泽东受到不公正的对待。

1931年1月5日王明上台，11月7日~20日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（即赣南会议）在江西瑞金举行。毛泽东虽然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，但会议一开始就被指责为所谓的“右倾”。1932年10月“宁都会议”毛泽东失去军职（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），批判毛泽东是“右倾机会主义”。贺子珍回忆，毛泽东当时说：“教条主义真害死人！他们不做实际工作，不接触工人、农民，却要指手画脚，到处发号施令。同国民党打

仗，怎样才能取胜？农民为什么会革命？他们懂吗？”

由于党内顾顺章、向忠发等人的叛变，地处上海的党中央处在危险之中，领导人被迫陆续转移。1931年9月，王明被上海恶劣的环境吓倒，跑到莫斯科去了。博古是王明指定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。王明让博古留在国内“负总责”，并派出大批“钦差大臣”到各地去指导工作。

1933年1月，博古在大城市也站不住脚了，中共临时中央迁入到农村革命基础较好、较安全的瑞金后，与原有的苏区中央局合并了。26岁的博古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人。

1934年1月中旬，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，会议号召全党要“集中火力反对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”。把毛泽东指责为“富农路线”。会议期间，博古指名由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，周恩来向博古提出不同意见：“让张闻天顶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似无此必要。”博古仍坚持自己的意见。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。

3月15日，博古领导的中央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一号训令，主要是批判毛泽东的主张，提出“必须坚决打击以纠正过去左的倾向为借口，而停止查田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”。训令还说：“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险。规定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与富农，不论有何证据不得翻案。已翻案者作为无效。”由于博古“左”的错误在苏区进一步扩大，引起了中共苏区社会上的混乱。

毛泽东后来对外国记者谈起这段艰难的处境时说：“他们迷信国际路线，迷信打大城市，迷信外国的政治、军事、组织、文化的那一套政策。我们反对那一套过‘左’的政策。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，可是我们被孤立。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，后来就不灵了。他们把我这个菩萨浸到粪坑里，再拿出来，搞得臭得很。那时候，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，连一个鬼也不上门。我的任务是吃饭、睡觉和拉屎。还好，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。”

博古到苏区后采取各种步骤，要架空毛泽东。因为毛泽东在苏区影响

太大，在共产国际那里也是一面旗帜，后来，博古想把毛泽东、周恩来一起弄到苏联去“养病”。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也怕毛泽东在自己的身边，王明说：“毛泽东能抓得大事，这么大的人物来，谁保险？”由于共产国际不同意毛泽东离开中央苏区，博古只好将毛泽东留在身边。

毛泽东受到不公正的对待，在无职无权和被批判的情况下，只好做一些纯政府工作，或者是静心读书。1957年毛泽东感慨地对曾志说：“我没有吃过洋面包，没有去过苏联，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。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，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，开展‘十六字诀’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围战术，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我，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。1932年秋开始，我没有工作，就从漳州以及从其他人那里搜集来的书籍中，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，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。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，差不多整天看，读了这本，又看那本，有时还交替着看，扎扎实实下工夫，硬是读了两年书。后来写成的《矛盾论》、《实践论》，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。”



博古

毛泽东曾在1956年9月10日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二次全会上谈到自己犯错误和受处罚情况时说：“至于三次‘左’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、打击，包括‘开除党籍’、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、赶出红军等等，有多少次呢？记得起来的有20次。”

从1931年的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，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，一直身处逆境，接连不断遭受批判和不公正对待。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的“赣南会议”上给毛泽东列了三大“错误”（罪状和帽子）。所

谓的“富农路线”。毛泽东制定的政策是：“以乡为单位，把这一乡所有的土地、山林都算起来，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等，折为谷的担数，再算这一乡有多少人（包括地主、富农在内），不论男女老少按人口平均分配，近山的多分山，近田的多分田，由农民的原有土地抽多补少，抽肥补瘦，生的不补，死的不退，确定土地私有权。”而王明提出的“地主不分田”、“富农分坏田”。所谓的“狭隘经验”、“游击主义”。所谓的“以党治国”。毛泽东建立的苏区最高领导机关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，他以总前委书记的名义发号施令，不论红军部队、地方党、苏维埃政府、各群众团体都可指挥调动。毛泽东首先倡导党领导军队。

王明路线认为这是“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”。王明的《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案》中指出“打破党的包办主义，把红军中超过政治委员、部的职权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取消”。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，再次撤销了毛泽东总前委书记职务。规定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的指挥机关，管理红军的组织与给养以及教育训练并指挥红军作战行动”等。放弃了毛泽东提出的党领导军队的提法。

毛泽东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，被严厉地指责为“狭隘经验论”、“富农路线”、“保守退却”、“右倾机会主义”。他在不短的时期内，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。这种“残酷斗争，无情打击”又来自自己的党内，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、宽阔的胸襟、钢铁般的意志，一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。

长征之前，毛泽东被派到于都地区搞调查工作。10月初，毛泽东在于都突然接到中央秘密通知，说有特别任务，要他火速赶到瑞金。回到瑞金，毛泽东到中革军委向周恩来报告了于都的敌情、地形等情况，周恩来告诉他中央要实行转移了，要他做好准备。毛泽东随后赶回家里，抱起自己天真可爱的孩子“毛毛”，毛泽东望着贺子珍说：“中央规定，这次转移，女同志不能随部队走，孩子更不能带。”贺子珍流着眼泪说：“我和毛毛也要跟红军一起走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我们都要一起走。”毛泽东心里很难受地说：“我怎么舍得把你们留下呢？”

毛泽东又赶到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，提出应带一部分女同志一起走，当他得知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随军行动的消息后，又马上跑到中革军委向周恩来提议：“在转移时将他和张闻天、王稼祥安排在一起行军，不要分散到军团里。”还说：“这次转移应该带一部分女同志走。”对毛泽东的提议，中革军委进行了考虑。中央经过反复筛选和身体检查，最后决定只带30名女同志走，不能带小孩。贺子珍跟30名幸运的姐妹被编入到卫生部的休养连里，小“毛毛”只好托付给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的毛泽覃、贺怡照顾。后来，由于国民党的残酷追杀，苏区变成了白区，毛泽覃、贺怡等留下的红军时常转移，“毛毛”就被寄养在当地老乡家，解放后，毛泽东曾多次托人查找，都没有找到。

毛泽东在怎样的情况下走上长征路的？1933年，蒋介石集中50万兵力，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“围剿”，同时进一步加紧经济封锁。他们把这两手同时并用：军事“围剿”是“杀死政策”，经济上封锁是“饿死政策”。1934年10月10日晚，中共中央被迫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实行长征，长征目标是什么地方，中央红军当时并不清楚。

对毛泽东这个“机会主义头子”怎么处置？博古和李德苦无良策，伤透了脑筋。博古和李德多次商量，本意是不带毛泽东走的，但后来，他们反复权衡，认为带毛泽东转移还是利大于弊。因为这时毛泽东在军内已无权，他这个国家主席一离开“共和国”（根据地）也失去了实际意义，在转移中起不了多大负作用。博古、李德还认为：“如果把毛泽东留下，准备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项英不是毛泽东的对手，搞不好毛泽东会东山再起！”

所以，博古和李德宁愿冒风险带毛泽东转移，把他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。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了长征路。

毛泽东说：“长征事前并无计划，没有人让我参加过长征的准备工作，我是在最后一刻才接到撤离通知的。”

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：“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，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，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。

后来，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，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，才被允许一起长征。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，结果就难以预料了。”

在李德的心目中，毛泽东算什么，不就是一个乡巴佬儿吗？没有他照样闯过敌人的封锁线。

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，通过了敌人第一、二、三道封锁线，进入到潇水、湘水地区。蒋介石判断红军将有西进的意图后，重新部署了“围剿”和堵截，并调派重兵企图将红军“歼灭于湘江、潇水以东地区”。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，毛泽东提议：“趁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，‘追剿’主力薛岳部、周浑元部还没有靠拢时，红军集中力量进行反击，寻歼国民党军一部，变被动为主动，扭转战局。”湘南地区，党和群众基础较好，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。三军团团长彭德怀也向中央建议：“红军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部队，迫使蒋军改变部署，阻击、牵制敌人。否则，将被迫经过湘桂边界的西延山脉，同桂军作战，其后果是非常不利的。”而博古、李德根本听不进这些建议，消极避战，丧失了战机。11月25日，红军被迫从广西全州、兴安间抢渡湘江。由于红军大搬家式的运动，行动缓慢，拖延了渡江的时间，红军大部队还未过江，就遭到优势敌军的夹击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。

湘江一战，红军惨败，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10万人，锐减为3.5万人。李德一面唉声叹气，一面诿过于人，他拿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开刀。这个师在湘江阻击战中，被占优势的敌人包围，周子昆带领部队突围，仅出来十多人。李德对周子昆一阵狂骂，指责他临阵脱逃，没有部队还有脸逃回来。李德让警卫班将受伤的他捆起来，送军事法庭处置。警卫班没人肯动手，李德见没有人动手，拔出手枪，想当场枪毙周子昆，博古站在一边不做声，毛泽东见状，立即上前干预，跟李德说：“周子昆交给我处理。”随后，将周子昆带走了。毛泽东并没有处置周子昆，而是与周子昆交谈，要周子昆继续带兵打仗。李德知道后，暴跳如雷，指责毛泽东是“收容败将，笼络人心”。

湘江的惨败，引起了广大指战员的深思，大家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德

国“军事专家”的指挥产生了怀疑，多数指战员对博古、李德的指挥表示了怀疑，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，都希望毛泽东能出来领导红军。于是就有了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——遵义会议。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时，苏区群众中广泛流传着《送郎当红军》的歌谣：

送郎当红军，革命要认清。

豪绅地主，剥削我穷人。

送郎当红军，坚决打敌人。

消灭反动派，大家有田分。

送郎当红军，切莫想家庭。

家中事务，妹妹会小心。

送郎当红军，纪律最严明。

放哨出勤，亲郎要小心。

送郎当红军，红军最文明。

公买公卖，大家都欢迎。

送郎当红军，阶级要认清。

富农流氓，都是不革命。

送郎当红军，冲锋杀敌人。

帝国主义，赶它不留停。

勇敢奋斗，都是为穷人。

送郎当红军，道理要认清。

反动宣传，亲郎切莫听。

送郎当红军，亲郎慢慢行。

革命成功，亲郎回家庭。

这一歌谣充分表露了广大农民群众对革命胜利的期待与盼望。

毛泽东取得领导权

在前往遵义的行军途中，毛泽东先取得王稼祥、张闻天的支持。当时，张闻天是政治局常委，王稼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，毛泽东与他们一路走一路讨论军事路线问题。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：“长征出发后，我同毛泽东、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。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‘围剿’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，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，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、博古的斗争，一直到遵义会议。”

刘伯承回忆：“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‘围剿’以来，迭次失利，现在几乎濒于绝境，与反四次‘围剿’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，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，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，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、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。这种情绪，随着红军的失利日益显著，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。”

黎平会议后，周恩来把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，李德看后大发雷霆，周恩来与李德争吵，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：“两人用英语对话，吵得很厉害。总理批评了李德。总理把桌子一拍，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了起来，熄灭了，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。”博古尽管自己意见被会议所否定，还是服从会议决定。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，对周恩来说：“不要理他（指李德）。 ”

之后，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规定：“关于作战方针，以及作战时间地点的选择，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。实际是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。”

争论一直在继续。周恩来说：“从黎平往西北，经过黄平，然后渡乌江

到达遵义，沿途争论更激烈，在争论的中间，毛泽东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。”

此后，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，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，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。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、博古轰下来的意见，并且说：“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，比我们有办法，我们是领导不了啦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。”

遵义会议，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，由张闻天（洛甫）替代博古负总责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最后决心的负责人，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协助者。

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的遵义会议，纠正了王明错误路线。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组织问题，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。遵义会议精神一传达，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。遵义会议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，纠正了博古、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，毛泽东一举扭转了航向，挽救了党和红军，挽救中国革命。

遵义会议参加人员名单：

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：毛泽东、张闻天（洛甫）、周恩来、朱德、陈云、秦邦宪（博古）

政治局候补委员：王稼祥、刘少奇、邓发、何克全（凯丰）

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：刘伯承（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）

李富春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）

林彪（红一军团团长）

聂荣臻（红一军团政委）

彭德怀（红三军团团长）

杨尚昆（红三军团政委）

列席会议：邓小平（红星报主编）

伍修权（翻译）

共产国际军事顾问：李德